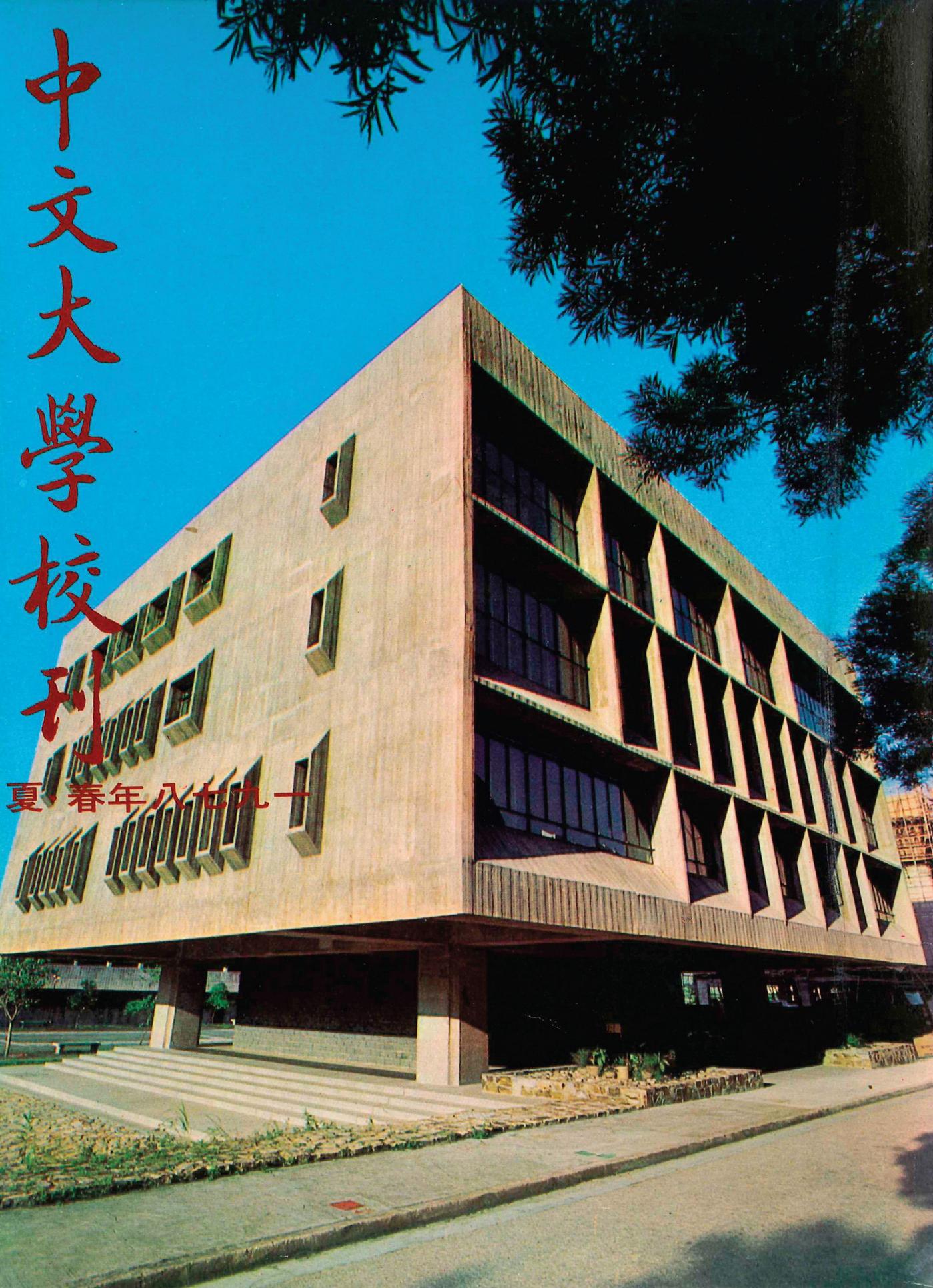


# 中文大學校刊

夏 春年八七九一



# 中文大學校刊 一九七八年春、夏

## 目錄

中文大學與法國政府合作	一
國際性會議	
東南亞研究院教學研討會	三
東南亞葯用植物研究諮詢會議	八
校園新建設	十
研究與研究院教育	廿一
新成立的研究單位	廿四
林聰標博士談計量經濟預測	廿七
醫學院消息	三十
智據的新世紀	卅一
歷年捐贈文物展覽	卅六
封面：兆龍樓（李旭初先生攝）	



「中文大學校刊」為純粹報導性之刊物，由中文大學出版，贈予大學教職員及各方友好。

### 大學校刊編輯委員會

宋 淇先生（主席）

姚啟昭先生

張端友先生

陳德全先生

陳燕齡小姐（秘書）

### 校刊編輯

宋 淇先生（編輯）

陳燕齡小姐（副編輯）

通訊處：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 中文大學與法國政府合作

中文大學與法國大學及教育機構全面性的合作計劃，最近獲得法國政府批准。過去十年來，大學與法國的合作，主要限於教授法國語文，法國政府協助發展法語課程的重點在於傳播法國文藝及文化。新的學術交流則是全面的、平衡的合作，包括在法語以外其他學科方面實行雙邊的交流計劃。

新的合作計劃是由法國政府與中文大學聯合訂立的，法國政府通過其在香港的代表——法國領事館，積極參與其事。法國政府並邀請中大派出代表團於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至廿八日訪問法國。代表團由校長李卓敏博士及候任校長馬臨教授率領，團員計有：

薛壽生教授 亞洲課程部主任兼政治與行政學教授

政學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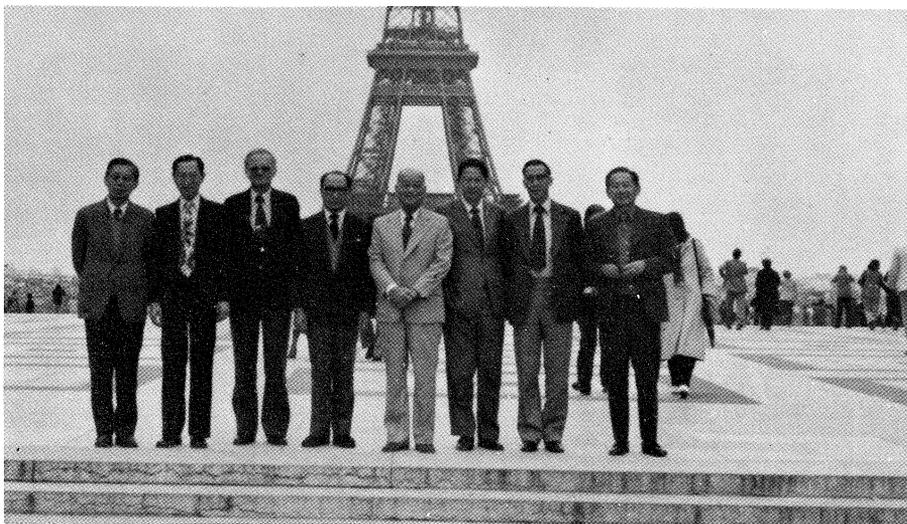
蔡永業教授 醫學院院長及行政醫學教授

鍾汝滔教授 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陳佐舜博士 大學教務長

陳荆和教授 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兼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中文大學代表團在法國



史大齡先生 (Mr. A. E. Starling)

醫學院策劃主任

中大代表團此行，獲法國外交部及大學教育部熱誠接待，法國駐港總領事羅理德先生 (Mr. Yves Rodrigues) 更專程返法陪同代表團參觀，可見法國政府的隆重其事。代表團先後到過巴黎、里昂、馬賽、埃克斯，及波爾多等地的主要大學及國立教育機構參觀訪問。

代表團這次訪問極為成功，不但增進了中大與法國教育機構之間的了解，並且是以後長期合作的開始。長期合作的範圍包括：醫學、應用數學、海洋生物學、工商管理學、人類學、中國及法國文化研究等方面。

中文大學代表團回港後，根據訪問時與各方面討論商談的結果，擬就多項合作計劃。

#### (甲) 中國及亞洲文化研究方面

(1) 法國漢學家前來中大做研究，並且充當法國與中大在中國文化研究方面合作的主要聯繫。

(2) 由巴黎第七大學東亞學系及中大的中國文化研究所聯合贊助「大越史記全書」校合計劃。

(3) 中大協助法國機構或個別學者在香港印刷出版有關亞洲研究的作品。

(4) 法國政府每年設立獎學金，供法國學生或學者前來中大參加亞洲課程部。

(5) 中大學者前往法國大學及書院訪問研究或蒐集中國文化研究方面的資料。

(乙) 在法國文化研究方面，法國政府繼續派遣客座教師到中大任教。

#### (丙) 在人類學方面

(1) 中大人類學組派出教師往法國大學考察，以求取有關法國人類學的第一手及最新資料。

(2) 法國政府安排法國人類學家前來中大開設課程。

#### (丁) 在應用數學方面

(1) 邀請一位或多位法國數學家前來中大教授應用數學。

(2) 中大派遣研究生往法國深造。

(戊) 在工商管理學方面，法國政府安排法國教授前來中大教授市場學與國際企業課程，以及主持研討會。

上述建議如果獲得批准，所提計劃將可付諸實行，藉此實現中大推進文化經驗交流的目的，以成爲一所真正的國際性大學。

## 東南亞研究院教學研討會

東南亞高等教育機構協會於一九七八年四月三日至六日假中文大學舉行東南亞研究院教學研討會，中文大學是協會的會員，這次是第二次被選為協會主辦學術會議的地點。參加東南亞研究院教學研討會的共有四十九人，其中包括協會會員機構及其他澳洲和英國教育機構的代表。

研討會的開幕及閉幕典禮，均由中大校長李卓敏博士主持並致辭，東南亞高等教育機構協會主席、泰國馬哈度大學校長史高泰教授 (Professor Swasti Skulthai) 在開幕典禮中亦有致辭。中文大學候任校長馬臨教授在研討會中發表主題演講。研討會一共舉行四天，討論主題分別為：

- (1) 研究與研究院教學
- (2) 研究院教育與社會需要
- (3) 地區性研究院教學之交換計劃

研討會的主要講者為馬來西亞大學校長雅

思教授 (Professor Ungku A. Aziz)、印尼大學副校長蘇友德教授 (Professor Sujudi)、南洋大學研究院院長吳德耀教授。三位中文大學代表分別以下列身份發表論文：邢慕寰教授為中大研究院院長、薛壽生教授為亞洲課程部主任、金耀基博士為社會學系主任。

李卓敏校長在閉幕辭中指出研究院教學是大學不可或缺的部分，因為藉着研究及研究院教學，可以在不同學科內，增加與這個地區有關的有用資料。此外，多數教科書都是在西方編寫，雖然其中包括一些極為有用的概念，但這些概念都是根據在西方國家蒐集所得的資料而得來的，因此東南亞的大學應該開始致力於蒐集自己地區和國家的資料，以補其不足；如果達到這個目的，研究院教學及研究工作就是最好的方法。李校長強調推展研究院教學和研究工作，可能所費不菲，但不完善的大學教育，就社會價值而言，損失反而更大。而失敗的大學教育，是人力資源的最大浪費。

## 研究院教育之

### 目的與困難

#### 東南亞研究院教學研討會的主題演講

馬臨教授

本人今天能夠在這裡說幾句話，與參加東南亞研究院教學研討會的學者專家交換意見，感到非常榮幸。

我講話的主要目的是就研究院教學提出總的看法，在這個範圍內，大家可以討論各方面的問題。研討會的小組討論，分別以下列三項為主題：研究、社會需求、地區性的交換計劃。雖然大會只選了這三項主題詳加討論，但是尚待研討的還有不少，其中有些對東南亞地區的教育機構來說，可能更為重要，不過，這次大會為了取得更充分的討論時間，不得不作出取捨。

我不敢自命為教育專家，更遑論是研究院教育的專家。我對於這題目的理解，與一般關心教育和對教育有較深刻認識的人無異。我現在謹就一些將會在小組中討論的問題提出個人的意見；稍後，我們中大代表團的幾位同事，將會宣讀論文，參加討論，對研討會作出具體的貢獻。

### 研究與研究院教學

關於第一項主題：研究與研究院教學。研究院教學是否必須訓練學生做研究工作？要回

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看看教學與研究的關係。現代的大學主要是致力於教學和研究這兩項相輔相成的工作。雖然在不同的年代，教學和推廣知識的領域所佔的比重是不同的，不過，無論在那一個世紀，大學的成員都有新的發明和發現，從而擴大學術及科學知識的領域。重視研究就是本世紀大學發展的最大特色，而研究，特別是科技方面的，通常都是規模龐大。

在大學的範圍內，教學與研究並無衝突。研究對教學必有所增益，根據羅賓士報告書 (Robbins Report)，研究是「一個含義甚廣的實用名詞，泛指一切能夠增進人類理解、評估、改造其世界及經驗的能力的智力活動。」如果教學只限於將已知的或相信是已知的學問一代一代傳下去，那麼知識結果就會變得迂腐、毫無生氣、枯燥無味。但是如果教師自己正致力於探求新的學識和思想，他的教學自然會是生動有趣的。根據一般的經驗，學術研究者在積極探討某一學科時，他不但會找到有關這學科的大量資料，並且會從更深更廣的新角度去看探究的對象。更遠大的目光和更深入的了解對教學是會產生刺激作用的，這點每個曾經受益的人都可作證。同時，不論所授課程的主題是如何陳腐和平凡，只要教師能夠對課程的內容和價值採取批判的態度，他們通常都會反覆思索或詳加探討，最後進而深入研究。

至於大學教育的目標，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大學教育必須為學生提供與他們將來的事業有直接關係的學問和技能，協助他們培養分

析的能力和批判的態度，作為價值判斷的基礎。此外，又要助長他們的求知慾，使他們更熱中於深入探求一般性的基本原理。

大學要求學生在畢業時除了要熟習和掌握了一切本行的知識，更要有開放的態度，能夠接納新思想，主動地去探討事物的究竟，而且要有能力去應付新事物，此外，又要能夠信心十足地獨立工作。這些要求，對研究生尤其適用，因此訓練研究生，必須包括如何運用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內；研究方法其實就是追求學問的最基本工具。

然而，訓練學生做研究，並非單是訓練學生有系統地尋求新知識而已，它應當包括其他方面的訓練，例如：如何將現有知識進一步發展，以供實用；如何審慎評估現有的知識、藝術作品或哲學思想；如何保存人類積聚得來的知識、經驗、藝術創作。羅賓士報告書指出：「有許多具有超卓能力的人才，特別是在人文學科方面的，從來沒有做過任何狹義的研究，或感覺到發表的強烈要求，然而他們淵博的文化學識、成熟的判斷力、廣泛的研究興趣，對學系或書院都是難得的財富。」這類教師對培育研究生更能多所貢獻。

若干大學在多門學科中設有兩類研究院課程：「研究」學位課程與「修課」學位課程。此外，職業性學科又設有研究院程度的「修課」文憑課程。如果我們認為訓練學生做研究是研究院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那麼，在「修課」學位的課程中，如何提供這類訓練和評審訓練的成績？

訓練學生做研究在不同學院所佔的份量或許毋須盡同，對於科學方面的探討，研究自然十分重要，但對文科方面的則不然。研究科學的人通常只是研究隊伍中的一員，所從事的研究是可以與實驗室其他的研究結合在一起，成為整個計劃的一部分。但是研究文科的人却不同，他們經常就個別題目做研究，而所研究的題目，或許也需要跟不是常常見面的導師討論，不過，有些題目卻非常偏僻，這些問題就是闡明了，也只能對人類知識略有增益，但對人類的幸福可能全無貢獻。不過，雖然我們可能懷疑一些文科方面的研究是否有用，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大學的一個目標就是純粹追求學問，不受社會、政治及教條的限制，雖然它同時又不能忽視了傳授予學生在社會上生活立足的本領。

### 研究院教育與社會需要

現在讓我們看看研究院教育與社會需要的關係。由於研究院教育能使人類思想開放，這種教育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需要。研究院教育的擴展是無可避免和合乎需要的，而發展研究院工作最有力的理由就是知識的激增，很多人都不再認為接受了本科教育就可以進入知識領域的堂奧，而那些想成為真正專業人才的人，亦了解到他們必須入研究院進修。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毋須再辯論研究院教育應否受到限制，這種限制論是根據「越多就越壞」的論調而來的。「越多」是由於有更多人獲得接受教育的機會，特別是有才能但

以前却苦無機會發揮所長的人，而很明顯的，訓練這些有才能的人只會對社會有利。另外一種謬論是研究院不應發展，因為社會上不可能有足夠職位去容納具有高等學位的畢業生。其實供應適足以提高需求，而就業機會是可以適應教育制度的變更的。根據世界其他地區的經驗，就業機會實際上會適應不同的情況，例如把原來由大學畢業生、甚至是非大學畢業生做的工作，改為聘請具有高等學位或受過研究院訓練的人去擔任。這項改變的後果，對經濟亦是有利的。不妨舉一個例來說，僱用受過更多訓練的人才如博士或工商管理碩士來擔任生產或管理的工作，對業務將有很大幫助。不過就算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並無擴展研究院教育的需要，我們仍然認為這是值得做的，因為判斷教育的功能，無疑應該根據其對文化的質素、對人類幸福所作出的貢獻，和能否使人徹底發揮個人的才能而定；把教育視為製造物質財富的附屬品，眼光未免太淺。

研究院是學術、研究以及教學的中心。它必須力求達到卓越水平和保持學術自由。研究院如果能夠在人類知識的領域內努力，對於學術新發展亦步亦趨、為學生提供高等的訓練，就是對社會的長期需求大有貢獻。不過，這並不表示研究院教育忽視了較為急切的短期問題，研究院對目前的社會需求亦應同時兼顧。在這方面，它可以為各行業的畢業生開設進修課程，向社會人士介紹各門學問的最新發展，以至做一些研究，幫助解決社會上迫切的問題。

## 地區性交換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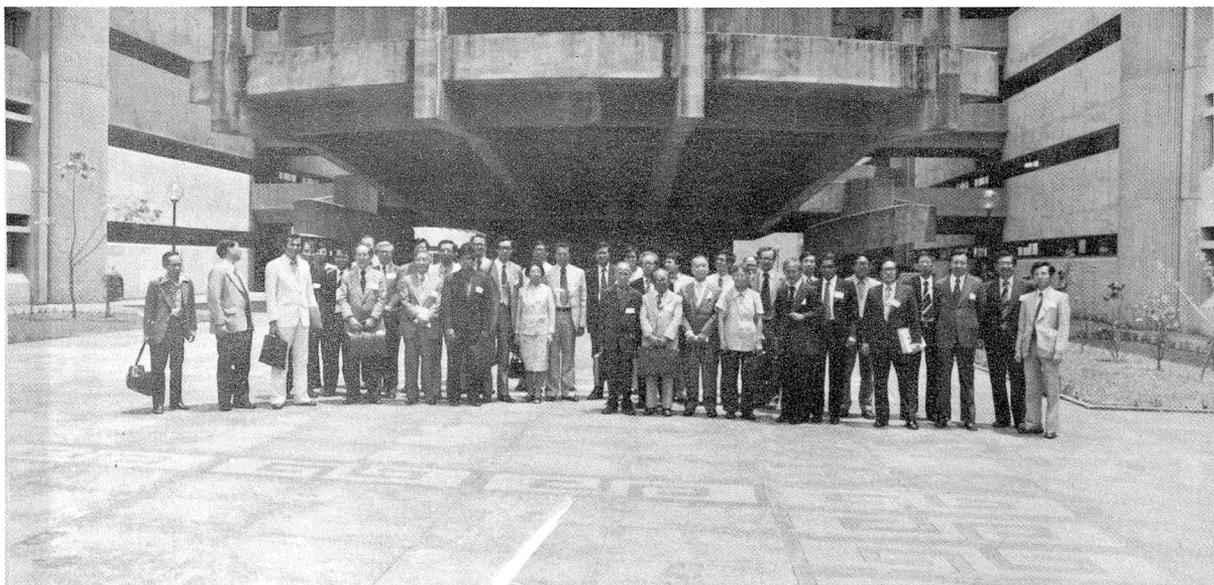
至於第三個主題：研究院教學的地區性交換計劃。究竟是否有這類交換合作的需要呢？答案是肯定的。雖然對非亞洲人來說，所有亞洲人長得都很相似，而東南亞地區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也只不過是一個很小的地區，不過，對我們自己來說，這地區是多個偉大文化如中國、佛教、回教、伊斯蘭教的發源地，每個民族都有自己豐富的和不同的文化遺產。此外，我們之中很多人都曾先後接受過西方及基督教化的影響，這樣多樣化的背景，正足供我們互相借鏡。

到目前為止，研究院教育方面的交換都是非正式或沒有組織的。例如，一所大學的教師可能不時應邀出任其他大學的研究生的校外考試委員。或在休假時，担任本區其他大學的研究院教席；香港的大學畢業生可能到新加坡、曼谷或馬尼拉深造。然而這些都是個別進行的事，如果我們要鼓勵東南亞高等教育機構協會成員之間密切合作，就一定要採取積極的行動去訂立更多有意義的交換計劃。此外，這類交換對本區研究生將有實際的好處，一來費用較少，二來所學的東西較為切合自己地區的需要。如果我們要把研究院教育中的交換計劃制度化，工作必然極為艱鉅，所遇困難必然很多。即使本區政治氣氛融洽，要考慮的因素仍然很多，例如是否可以互相承認對方頒授的學位、教學重點是否一致、授課語言不同、費用的差距等。不過，以前能夠做到的，現在也應該可

馬臨教授在東南亞研究院教學研討會上演講



東南亞藥用植物研究諮詢會議參加者合照



東南亞研究院教學研討會



以再做：如果香港的大學能夠與北美洲和英國的教育機構訂立交換計劃，就沒有理由不能與東南亞區的大學訂立同樣良好或更好的交換計劃。事實上，參加這次研討會的代表都是有備而來，各位對於如何實行研究院教學方面的交換計劃，必定有許多獨到的看法，就讓我們在以後的小組討論中聆聽各位的高見。

我想就東南亞高等教育機構協會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說幾句話。如果要由協會贊助，在各機構之間進行研究院教學的交換計劃，是有各種可行的方法的。最低限度，協會可以成為資料交換處，提供各會員區在研究院教育方面的資料，包括入學標準、課程要求、費用及獎學金等；它又可以贊助各種符合會員機構需求的交換計劃；此外，又可以安排師生的交換，如有可能並給予他們津貼和獎學金。而最理想的，或許是由協會成立一個研究院教育中心，設置研究及攻讀學位所需的設備，主要是供會員機構的教師在休假時進行一些地區性的研究或教學，和供研究生在中心攻讀高等學位或修讀一些有學分的課程。藉着東南亞地區各機構的共同努力，這計劃一定可以實現。

我說了以上的一番話，是因為我衷心相信東南亞高等教育機構協會會員都確實在研究院教育方面有合作的需要，以增進整個區域的利益。我們今天在這裡相聚，就證明了各會員對這個主題極感興趣。最後，讓我們祝願，即使東南亞高等教育機構協會不能在本區內實現「四海一家」的精神，也能加深地區性的了解。

# 東南亞藥用植物研究諮詢會議

東南亞藥用植物研究諮詢會議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九日至廿二日在中文大學舉行。會議由聯合國科學及文教組織屬下之東南亞區化學與自然產物組、美國亞洲科學及醫學高級研究所、中文大學聯合舉辦，目的在商議設立聯絡中心，以製訂有關東南亞藥用植物研究的地區性合作計劃。

參加會議的科學家共四十餘人，其中包括來自自由聯合國科學及文教組織贊助的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及香港代表。在開幕典禮中致辭的計有：大學校長李卓敏博士、香港科學協調委員會主席鍾國棟先生 (Mr. G. J. Bell)、聯合國科學及文教組織戴錫華博士 (Dr. E. J. DaSilva)。本校化學系主任張雄謀教授以籌備委員會主席身份介紹諮詢會議的目的及內容。

張雄謀教授指出，現在單靠西方醫藥並不能應付世界醫療服務的需要，因此一些國際機構如世界衛生組織，已經認識到必須鼓勵人們更好地利用傳統醫藥及草藥。不過，許多評定常用草藥的效能的研究仍未有人去做。目前用於西方醫學研究的費用極鉅，如果將其中小部分用來研究草藥，在這方面必然會有重大的突破。近年來生物化學、科學儀器及其他方面的

發明和發現，為科學家提供了許多新的研究工具，這是廿五年前想也沒想到的。

會議上作主題演講的是三位藥用植物的世界權威：

哈佛大學阿諾·阿伯爾定植物研究所及中文大學胡秀英教授主講「東南亞藥用植物研究中的植物學探討」

日本明治藥劑學院柴田承二教授主講「中國藥物的化學成份」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亞洲科學與醫學高級研究所高逢田教授主講「藥用植物的展望」

會議最後決定在香港設立藥用植物研究聯絡中心，隸屬於聯合國科學及文教組織之東南亞區化學與自然產物組。聯絡中心的工作包括：

- (1) 滙編各地之本土醫藥資料；
- (2) 選出可供實驗研究的亞洲植物；
- (3) 根據各地的衛生水平，促進藥用植物的研究。

聯絡中心的工作由中文大學中藥研究組負責。

目前正在進行的地區性合作計劃計有：

- (1) 藥用植物審查研究
- (2) 人參在植物化學及生物學上的效用

- (3) 梔子研究
- (4) 九里香研究
- (5) 穿心蓮研究
- (6) 異喹啉生物鹼研究

(7) 姜科研究

中文大學為配合葯用植物研究諮詢會議，又由四月二十至廿二日在大學圖書館舉行葯用植物書籍展覽，展品包括草葯研究的中國古籍及介紹中葯發展的圖片。

### 李卓敏校長歡迎辭

各位嘉賓：

歡迎各位參加東南亞葯用植物研究諮詢會議的開幕典禮。中文大學能夠和聯合國科學及文教組織、美國一所研究機構共同舉辦這次會議，並且忝為東道，招待鄰近各國的參加者，實在是無上光榮。東南亞地區舉行這類會議，還是首次。

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以葯用植物治病的歷史非常悠久，甚至比西方科學的發展還早。事實上，目前在東南亞仍有成千上萬的人用草葯治病，顯見有些植物及草葯是有實際療效的，因此用科學方法來鑑定草葯的功能，準確地找出它們的利弊，是很順理成章的事。研究草葯的成果，不但對東南亞地區人民的保健有所裨益，就是對全世界抵抗疾病和醫學發展也有同樣大的貢獻。此外，幾千年來，用草葯治病主要是憑東南亞各地經驗的累積，逐步發

展起來的，可惜這些經驗並沒有科學化的紀錄。因此用科學方法來研究草葯是很需要的，因為可以藉此將歷代流傳下來的有關草葯的寶貴知識加以評價、吸收，並傳播給有志於這方面研究的人。

一直到二十世紀，我們才運用如分析、實驗、研究、紀錄、儲存資料等科學新法來研究葯用植物。西方科學家和國際機構如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等，已認識到草葯的潛能可以克服若干西葯未能克服的困難。中文大學因此於一九七五年在理工研究所內成立中葯研究組，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研究組已經獲得好幾個國際機構的大力支持，這是值得欣慰的。這次由聯合國科學及文教組織屬下的東南亞區自然產物化學組織、美國的亞洲科學與醫葯高等研究所、中文大學合辦諮詢會議，就是在葯用植物的科學研究上國際合作的另一個例子。我們一致希望，這次會議只是開端，以後東南亞各國將會不斷努力，合作研究，自由交換研究所得和經驗，這是鞏固及增進草葯知識所不可缺少的。

最後，但並非不重要的，我希望借今天這個機會強調，研究葯用植物的工作，對中文大學有特殊的意義。融會中西文化是大明白揭槩、我們一向鏗而不捨的目標。我們認為，科學化地研究葯用植物，是用西方知識去研究大體上是中國或東方文化遺產的實踐，同時也向融滙東西文化那方面跨了一大步。

本人現在宣佈東南亞葯用植物研究諮詢會議開幕。



# 校園新建設

中文大學校園的建設，每年都有增加，一九七八年上半年，先後落成啓用的建築物計有：兆龍樓、文物館工作處、三座學生宿舍、大學運動場有蓋看台、八座網球場，此外，已經奠基的有獅子亭。

## 兆龍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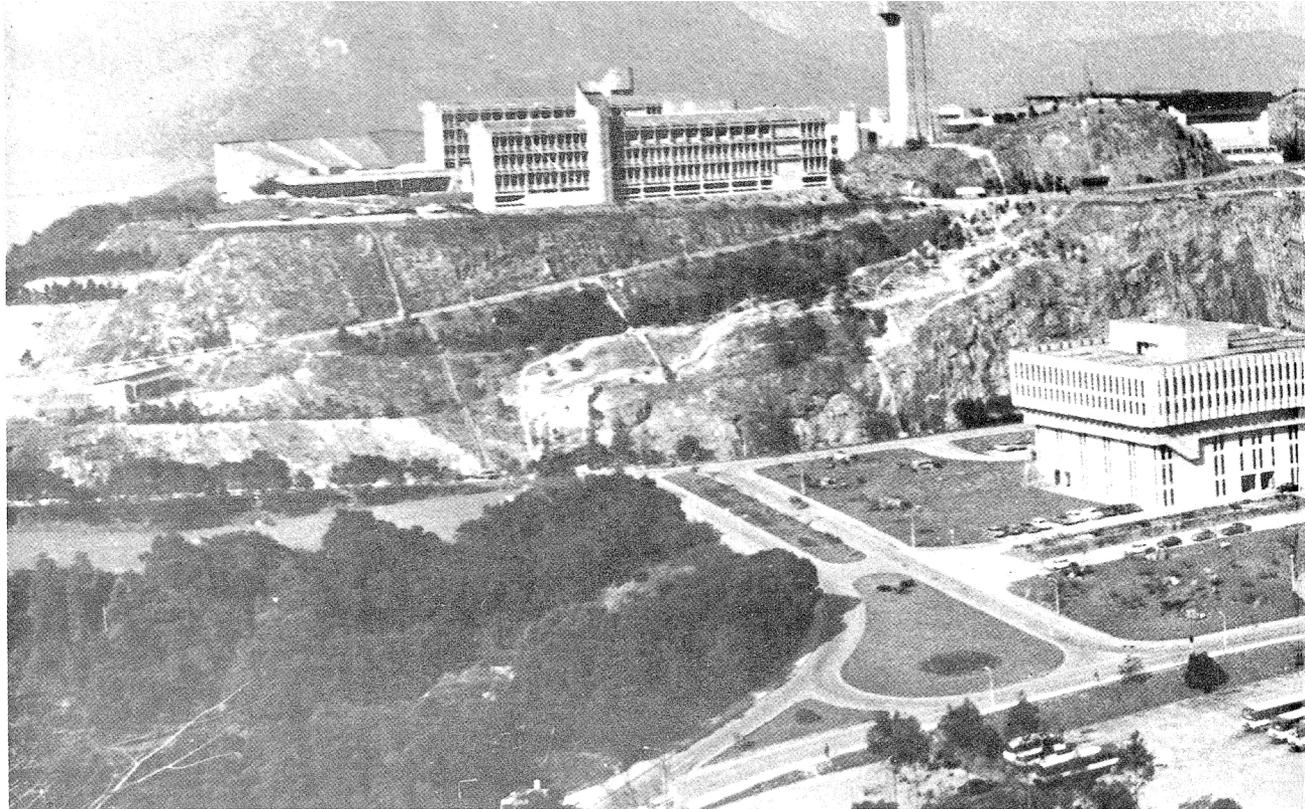
大學綜合活動中心是由碧秋樓、兆龍樓及大學講堂組成。中心所容納的單位，包括大學多個研究及服務部門，以及文學院、工商管理學院、社會科學學院的辦事處。綜合活動中心的作用與科學館極為相似，分別為文學、工商管理學、社會科學三學院及理學院各學系服務。因此，兆龍樓落成對於集中發展各項綜合活動及資源滙濟，貢獻良多。

兆龍樓高四層，面積共一萬四千平方呎，其中設有研究院、公共事務研究中心、經濟研究中心、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三年制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部、亞洲課程部的辦事處，以及醫學院臨時辦事處。

## 文物館工作處

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經常舉辦展覽和出版目錄。展覽、出版以及整理藏品，在在需要專門技術性的服務。近年來文物館迅速發展，這類服務的需求遂與日俱增，因此特別興建文物館工作處，供文物館技術工作組使用。

文物館工作處分三層，面積三千五百平方呎，內設：(1)古物修復室及古物保護實驗室，置有各種科學檢驗儀器，(2)書畫裝裱室，(3)木工房，(4)攝影室及黑房。



## 學生宿舍

大學為緩和學生住校的急切需求，因而進行一項費用達一千一百萬港元的學生宿舍興建計劃，共建宿舍四座，其中三座最近落成，計為：崇基學院何善衡夫人宿舍、新亞書院學思樓、聯合書院伯利衡宿舍。新宿舍高六層，每座有雙人房一百一十間，二百二十名男女學生可於一九七八至七九年度入住。第四座宿舍可容納學生一百一十六人。

## 大學運動場有蓋看台及網球場

增置體育設備對改進大學體育課程及應付大學人士在體育活動方面的需要，幫助甚大。

大學運動場看台於一九七七年落成，有蓋看台可容納一千八百名觀眾，建築費用達一百五十萬港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有限公司捐建。

一九七八年內有八座網球場先後落成啟用，其中五座由香港政府撥款興建，其餘三座由香港蜆殼有限公司捐建。

## 獅子亭

大學將在崇基學院荷花池上小島興建中國式圓亭——獅子亭，為大學校園增添一景，並為校內師生增設一個遊憩之所。獅子亭在一九七八年六月奠基，全部工程預料可於本年年底完成。

上述建築計劃得以進行及完成，主要是獲得外界資助，其實，就整個中大校園而言，由外界捐建的部分亦屬不少。大學監督麥理浩爵士在兆龍樓開幕典禮中就曾經說過：

「建築費用的成本達到二億四千萬元，其中大約二億零五百萬元由政府撥出，而其餘大約三千四百五十萬元則屬私人資金，這是要從私人方面籌措得來的一筆數目巨大的金錢。私人方面這樣急公好義，對香港高等教育之需要予以支持，實令政府、社會各階層、及大學當局感激不盡。」

# 兆龍樓開幕典禮

中文大學於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二日舉行兆龍樓開幕典禮，由大學監督麥理浩爵士主持。

兆龍樓由香港商業鉅子、環球航運集團董事局主席包玉剛博士捐建，包博士秉承其父親包兆龍先生熱心社會教育的素旨而慷慨贈巨款。

中文大學為配合工商業教育的發展，早計劃興建一座工商管理、經濟研究和公共行政大樓，至一九七五年，由於世界性經濟衰退，香港亦深受影響，這項計劃被迫暫時擱置。包玉剛博士就在這個困難時刻，慨然捐出三百廿九萬餘港元，作為兆龍樓的全部建築費用。兆龍樓的建築工程乃得於一九七六年展開，並於一九七七年九月底完成。



左起：包玉剛博士、包兆龍先生、李卓敏校長、麥理浩爵士、簡悅強爵士

## 大學監督麥理浩爵士講辭

(香港政府新聞處翻譯)

校長、包兆龍先生、各位嘉賓：

由於包氏家族的慷慨，我們今日才得以慶祝這座宏偉大樓開幕。這座大樓象徵中文大學在發展方面又向前邁進一步。

自從一九五六年以來，崇基書院一直設校於此，但整個大學校園的建築工程則由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開始，當時上任港督戴麟趾爵士曾植樹於此以資紀念。我說「種植」，但有人告訴我，當時需要從碎石及沙礫堆中鑿出一個小洞以放置該株幼樹，因為我們現時所站立的位置以前只是一片滿佈亂石和塵土的荒野而已。現在說來，已經是差不多整整十個短促但非常忙碌的年頭以前的事了。

從任何標準看來，該時期後的發展工作進度極大。及至一九七三年年中時，那時距離第一個儀式舉行的日期只有五年半，中文大學的校舍便在這個地點逐一矗立起來。而我們現在看到的宏大的現代化的大學，只需十年時間便告全部完成。這實在是一項非常巨大的工程，而很多人曾參予其事，包括建築師，行政人員，承建商以及政府與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人員。但毫無疑問，主要的責任落在大學建築處及校長身上。我非常高興在此公開對各有關人士的超卓成就表示謝意。

建築費用的成本達到二億四千萬，其中

大約二億零五百萬元由政府撥出，而其餘大約三千四百五十萬元則屬私人資金，這是要從私人方面籌措得來的一筆數目巨大的金錢。私人方面這樣急公好義，對香港高等教育之需要予以支持，實令政府、社會各階層、及大學當局感激不盡。

這些人士當中，當然有包兆龍先生和包玉剛博士父子所代表的包氏家族在內。倘若沒有他們襄助，這大樓斷不能在現時建成。

這座大樓初時是打算作為一項合共有三座大樓的建設計劃的其中一部分。但由於七五年間之經濟衰退影響，上述計劃便擱置下來。當時包氏家族便見義勇為把原來捐贈款項增加一倍以上，使計劃得以重新開始和使這座大樓建成。

這座大樓將作為工商管理、經濟研究和公共行政大樓之用，並且最低限度會在初期供研究院及籌設中的醫科學院在其中設立行政辦事處之用。

校長李卓敏博士對工商管理學科的注重和他在這一方面的卓越成就，為大家所深知，因此，我知道包氏家族使到這座工商管理學科使用的大樓得以在李博士任內開幕和使這座大樓亦供同為李博士特別注重的其他專業學系之用，實在是使大家深感特別欣慰的一件事。

最適當的莫如把工商管理科跟包氏家族聯想在一起，因為我猜想，能夠有很多關於工商管理實用學識灌輸給他人的人士為數無多，包氏家族的超乎尋常的勤奮能力，精明頭腦和嚴

格修養，應可使這兒工作的人士受到感召，我謹祝各人在商業上獲致同樣成就和闔家幸福。

校長，包先生，各位嘉賓，本人謹宣佈兆龍樓開幕。

## 包玉剛博士講辭

督憲閣下、李校長、各位嘉賓：

今天中文大學的工商管理、經濟研究和公共行政樓舉行啓用禮，承蒙港督兼大學監督親臨主持，我感到萬分榮幸，首先我要向他致謝。督憲閣下一向重視香港教育的發展和設施，我所深知，今天他惠然肯來，是又一證明。

李校長因為舍下各人對於籌建這座樓曾經略盡棉力，提議用家父的名字「兆龍」命名，我也要向他致謝。家父以八十三歲的高齡，今天能躬與其盛，我自然極其欣慰。

我記得中文大學在一九六三年正式成立。短短十四年工夫，因為主持得人，設備優異，課程質素和各學院師資都屬一流，已經在東南亞地區，巍然躋身於最著名的學府之林。

大家往往說，世界進展奇速，大學身為教育機構，為了達到傳授高級知識的任務，在學術方面，一定要有相當的獨立和自由。這種想法我再贊成也沒有了，現在發見中文大學實際上已經把這個觀念充分實踐，自然非常欣喜。這許多年來，中大身為香港主要的最高學府之一，任務重大，已經切實做到不受外來影響的地步，成爲一個獨立的學術機構。

我和家人久居香港，我們能對若干在本港值得推動的事務，尤其是教育和學術，稍效微勞，是既愉快，也光榮的事。我們盡力而為，眼看嘉猷厥成，今後香港青年培植有所，實在歡慰無限。大學創辦初期，早有興建大樓，專供高級工商業教育之用的計劃。我素來認為工商業教育是大學教育的要務，香港整個社會的福利依賴貿易和經濟的興隆，非常之大，因為我廁身商界，特別注重這方面的教育，自屬順理成章。今天家父和我眼看兆龍樓完工，

正式啓用，衷心愉快，覺得此舉實有特殊的意義。

前途設想，盡其所能，出錢出力，補助政府完成這件要務，義不容辭。

我們都明白，教育是世界進步的重大推動力。教育青年一代是社會工作的一端，這件工作世界各國的政府非特別注意不可。香港人口密度驚人，土地奇缺，青年教育的問題特殊，在東南亞地區堪稱獨一無二。多年來政府都在竭力定下目光遠大、兼籌並顧的教育計劃，不過各種困難自然是免不了的，社會人士為香港

多謝各位！

今天各位貴賓惠然撥冗，參加這個盛典，我必須向他們衷心道謝。末了，我尤其要向許多位建築師、設計師、工作人員、工人，表示感謝，多虧他們千辛萬苦，這座樓才能克底於成。

# 文物館工作處啟用禮

中文大學校長兼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李卓敏博士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十四日為文物館工作處主持啟用禮。

## 大學校長李卓敏博士演辭

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自一九七一年成立以來，各方面都有具體和高度的進展，大約可以分四方面來說：

藝術系提供教材。

(一)建立了資料室，為研究工作提供了基本設備。目前一共有：

文物館近年來的發展，極為迅速，除經常舉行文物書畫展覽外，更成為大學一個重要的教學和研究單位。文物館內的設備逐漸不足以應付繁重的工作，利希慎基金會有見及此，遂繼一九七〇年捐建整座中國文化研究所之後，慷慨捐出五十二萬三千港元，興建文物館工作處，供館內技術工作組使用。

(二)建立了資料室，為研究工作提供了基本設備。目前一共有：

1. 明清廣東書畫近千種
2. 秦漢鉢印二百餘種
3. 宋明玉花四百餘種
4. 宋拓華山碑和宋拓蘭亭十一種
5. 揚州派書畫九幅

最重要的是這些圖片和幻燈片多數對象為本館和本港收藏家所有，用以和世界其他各地的收藏者交換，可使文物館的資料日形豐富。

文物館為工作處啟用誌慶，特別舉行「歷年捐贈文物展覽」。

這些藏品主要依賴一九七二年成立的籌募委員會和各有心人士的捐贈得來，使文物館得以進一步支持本所的研究工作，並為

(三)自成立以來，文物館經常舉行專題展覽，至今日為止已舉行了卅次之多，內容包括考古，陶瓷，金石，玉器，書畫，樂器等。

例如：

紅樓夢資料展（一九七二）

華光藏瓷展（一九七四）

至樂樓藏明遺民書畫展（一九七五）

玉器展覽（一九七七）

還同時舉行了國際性研討會，並將論文編為專書出版。其他各項專題展覽亦均印有目錄，作為交換及供應愛好藝術家之用。文物館本身力量有限，每次展覽都依仗熱心人士慷慨借出珍藏並捐出印刷目錄的費用，對提高本港市民對中國藝術的興趣和輔助文娛活動產生一定的作用。沙田雖然離市區較遠，文物館在週末仍然開放，最高紀錄達一日四千餘人之多。

（四）為配合以上的經常活動，文物館成立了自己的技術工作組，分為四部份：

1. 裝裱書畫——舊畫新畫的裝裱

2. 攝影——圖片和幻燈片的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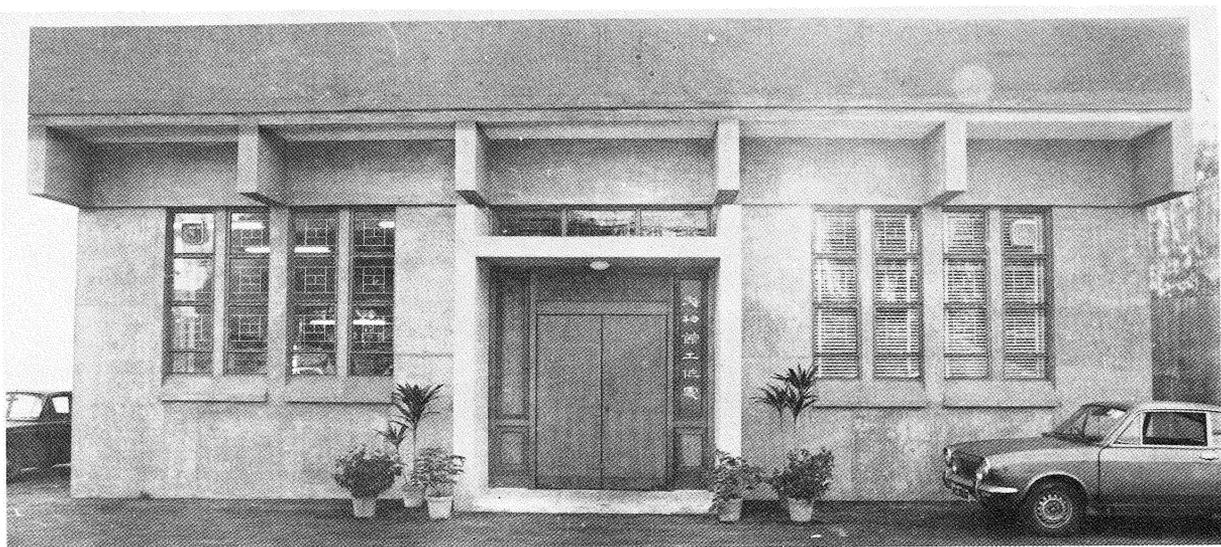
3. 木工——製造部份展覽櫥和其他展覽器材

4. 文物的修復和科學鑑定與分析——其中科學鑑定與分析和科學館物理系合作，利用中子活化法分析文物館所藏青銅鈇（鑿）印的金屬成份。這種科際合作的研究一向是大學所鼓勵的。

香港極缺乏博物館學這方面的專門人才，特別是用科學方法保管和修復文物這類工作，更是新的學問。所以文物館的同仁，大多數是由文物館本身加以訓練或在本港專家指導之

下，或到海外深造以學到專門性技術。至於工作的大部份器材和到海外受訓的費用也都是由熱心人士所捐助。最近，利希慎基金會的負責人有意鑑於文物館的工作場所不敷應用，遂決定在文化研究所的右側另增建一所分館，專作以上各項工作之用，並負擔全部建築和部份設備費用，定名為「文物館工作處」。大學對利希慎基金會的不斷慷慨捐贈和支持，很難用言詞來表達，因為中國文化研究所和文物館根本是他們一手獨力捐贈的。以後每次展覽和學校方面有所匱乏，他們一定作出及時和有意義的貢獻。相信今後文物館一定可以在書畫裝裱和文物的科學鑑定方面有具體的進展，庶幾可以不以負利希慎基金會的厚望。

我尤其要特別提出感謝的是利榮森先生，他代表利希慎基金會之外，一開始在文物館成立時就出任籌備委員會委員，隨後並任文物館管理委員會主席，一直到今天，並邀請何耀光先生和林秀峯先生參加出任委員。文物館事無鉅細，都由他們抽出寶貴的時間來開會，並出錢出力玉成其事。大學方面雖然盡力協助文物館的發展，如果沒有他們的大力支持，屈志仁館長和他的同仁不可能創造出今日的成績。所以我們今天的小型展覽會特別挑選熱心人士捐贈給文物館的藏品來公開展覽，以表示我們對愛護我們的友好的不斷協助表示由衷的感激。我現在宣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工作處」正式啓用。



# 網球場啟用禮



大學於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為三座網球場舉行啟用禮，典禮由香港規設有限公司常務董事長羅倫士先生(Mr. J. M. Lawrence)主持。

三座新建網球場位於大學運動場側，由香港規設公司捐贈十六萬四千港元興建，藉以提高大學師生對網球運動的興趣。

左起：中大學生會會長黃志新先生、鄭棟材先生、香港規設有限公司人事及公共關係經理許忠揚先生、李卓敏夫人、羅倫士夫人、香港規設有限公司常務董事長羅倫士先生、李卓敏校長、馬臨教授及楊乃舜先生



# 新學宿舍啟用禮

新學生宿舍啟用禮於一九七八年六月五日在崇基學院的何善衡夫人宿舍舉行，典禮由大學監督麥理浩爵士主持。

新學生宿舍興建計劃包括宿舍四座，其中三座最近落成：何善衡夫人宿舍、學思樓、伯利衡宿舍。整個計劃的費用超過一千一百萬港元，分別由兩個外界機構及香港政府資助：香港伯利衡有限公司早於一九七四年率先捐贈四百萬餘元，美國雅禮協會爲了提供宿舍予亞洲課程部的海外學生，同時捐助一百萬港元；其餘部份則由香港政府撥款支付。



麥理浩爵士與何善衡博士伉儷



樓思學院書亞新  
舍宿衛利伯院書合聯



# 大學監督麥理浩爵士演辭

(香港政府新聞處翻譯)

校長，各位來賓：

本人相信校長先生今天是懷着一種近乎快慰的心情，來歡迎這間宿舍的啓用。本人也很高興得知私人慷慨認捐之數，已超過全部費用的三分之一，使這三間宿舍得以完成。

這間設於崇基學院的宿舍以何善衡夫人爲名，藉以紀念何氏家族樂善好施的精神，至爲恰當。何氏家族爲興建這三間宿舍而認捐的款額，佔私人基金的三分之二有多。

身爲貴校監督，本人理應多謝政府負擔這些宿舍的大部份經費。我們認爲這些宿舍最有價值之處，是能夠爲學生提供良好的閱讀、思考及學習環境，而此等環境是由香港中文大學之興建及其概念所創造；開辦這所大學的意見十分偉大，建校地點壯觀，並且在李博士之英明領導下，辦理得非常完善。

我們究竟希望它履行何種任務呢？

在本人方面，我希望它能夠適合兩項目標，即學問和香港。

以學問爲目標是由於純粹爲學問與知識而

努力，能夠爲一所大學帶來靈感，權力和聲譽，並使學員對它產生尊敬。

以香港爲目標的理由是：爲使香港成爲一處理理想地方，我們亟需各種年齡，具有智慧的人士，而他們的智慧必須是從真正的學問及教育，加上實際經驗得來，也就是他們能夠從這裏所得到的學問和教育。

本人深信這些新宿舍，必定能提供一種有助於促進此等目標的環境，從而實現捐贈者、大學當局及其服務對象的理想。

本人謹以萬二分興奮之心情，宣佈崇基學院何善衡夫人宿舍啓用。

## 大學校長李卓敏博士歡迎辭

今天中文大學四所新學生宿舍舉行開幕典禮，蒙各位蒞臨出席，本人感到非常欣慰。

這四所宿舍建築費的來源有三。何善衡博士捐助港幣四百萬元，雅禮協會捐助一百萬元，不足的六百萬元由香港政府撥付。

今天舉行儀式的地點是「何善衡夫人宿舍」，這個名稱是特別用來表示中大對何氏伉儷的感激的。在這個名稱的後面有一個非常感

人的故事。一九七五年初，中文大學學生宿舍宿位不足，大部份學生感到不便，難以安心讀書。何善衡博士知道了這種情形，極其關切，隨即表示願意捐助四百萬元以促成新宿舍的建造。那時候正遇到社會上經濟不景，要立時籌集這筆鉅款，很不容易。何博士不顧當時地產價格低落，經他商得他夫人李怡顏女士的同意，毅然把原來購置預備自用的樓宇，賤價賣出，獲款三百多萬，其餘的幾十萬再由他本人補足。自他率先慨捐鉅款，中大再復另外獲得雅禮協會捐款，爲前來修讀亞洲課程之海外學生提供宿位，並取得政府的大力資助，四所新學生宿舍的建造才底完成。我們要向他們深致感謝。

宿舍的命名，本來何博士建議完全由中文大學擬定，後來還是本人再三商請，他才勉強同意，讓我們採用他夫人的名義以紀念他們的盛意。

何善衡博士這樣熱心捐助，對中文大學有形和無形的協助極大，因爲有了這批新宿舍，將來師生的接觸一定更加密切，學生減少往來的辛勞，一定能增加進修的時間。並且配合本校以學生爲本的政策，對提高教學水準必有具體的貢獻。

中大師生對何氏伉儷，雅禮協會及香港政府的慷慨捐助會永誌在心。

# 獅子亭揭碑典禮

大學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廿六日舉行九龍中央獅子亭揭碑典禮，由校長李卓敏博士及候任校長馬臨博士主禮。位於崇基學院荷花池上的獅子亭由九龍中央獅子會捐建，該會創會會長張介倫先生在典禮中主持揭碑儀式。獅子亭的工程預期可於一九七八年底完成。

## 香港九龍中央獅子會會長

### 張介倫先生講辭

今天我很榮幸能夠參加九龍中央獅子亭的奠基典禮，並且代表獅子會同人在這裏說幾句話。

中文大學抱着促進東西文化交流、服務社會的宗旨，不懈地從事教學和研究的工作，在短短的十五年內辦得有聲有色，成績斐然。我們特別感覺到興奮的是中大服務社會的宗旨與獅子會世界性服務社會的宗旨不謀而合，因此我們很想略盡心意，捐建一些樓房，協助中大進一步實現她的理想。可是中大校園的建設大致上已經齊備，所以捐建什麼是頗費躊躇的。

中大候任校長馬臨教授曾經說過，中大沒有校門，表示絕對開放，歡迎校外人士隨時參觀。的確，中大校園可說是屬於香港社會每一分子的，只要我們看看週末假日到這裡來遊玩的市民就知道。校園本身也在為社會服務這一點很有意義，而且恰當地給了我們啓示。中大校園極為吸引人，其中不少建築物都很類似中國古代庭園的亭台樓閣，與中大寧靜的氣氛非常和諧一致。校園內這個荷花池，幽雅有緻，如果在池中築一亭子，近可觀荷，遠可賞山，當更可為校園添一景緻，為師生添一促膝暢談之所。

獅子會因特捐建亭子於荷花池上。獅子亭承李卓敏校長親自題記，本人謹代表獅子會同人向李校長致謝，並借此機會祝中文大學對社會有更大的貢獻。



張介倫先生為獅子亭主持揭碑儀式

# 研究與研究院教育

邢慕寰教授

本文為中文大學研究院院長兼社會人文學科研究所所長邢慕寰教授在一九七八年四月舉行的東南亞研究院教學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

中文大學研究院成立於一九六六年，其下設五個學部。一九七二年大學圖書館及大學科學館落成啟用，一九七三年新亞與聯合書院先後遷入新校舍，與崇基學院同聚沙田校園內，研究院亦隨之而迅速增加新學部。目前，研究院共設有十八個學部，開設碩士學位課程（計有：哲學碩士、文學碩士、工商管理學碩士、神學碩士、社會工作學碩士），下學年將增設一學部，未來兩三年內又會開設多項新研究院課程。由於大學開設課程極為審慎，所以雖然多年前已有設立兩項博士學位課程——中文及電子學——的建議，但到現在仍在考慮，尚未付諸實行，不過，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大學將會開設這兩項博士學位課程。

中文大學的發展，有一點非常特別，就是先有一些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才有研究院的，不過，多數的研究中心，與研究院學部一樣，都是在一九七一年之後才成立的。目前中大有四個研究所和九個研究中心或研究組是在積極進行研究工作的。

雖然研究院及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組發展迅速，大學所強調的仍是質重於量。研究院成立了十年，一九七七—七八年度的學生人數只有二百五十二（其中有四十四人是攻讀一九七七—七八年開設的三年制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的），一九七七年考獲碩士學位的學生只有七十七人（其中二十位是攻讀兩年制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的）。在研究方面，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組完成及出版的論文專書不下數百種。

我現在將研究院學部和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組並列出來（見附表），大家就可以見到兩方面都保持差不多平衡的發展，雖然在一九七四—七六年間，研究院及研究所的發展，都曾因經濟衰退而暫時慢下來，然後在一九七七—七八年又同時恢復，再度加速。事實上，如果二者都依照目前的方向繼續發展下去，是不難見到四個研究所所屬的四方面——國文化、理工、社會科學、工商管理學——差不多相等於研究院各學部所歸入的四個研究範

圍——人文學科、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專業教育。又如果將研究所的「教師研究計劃」部分根據學科來細分，則更加容易見到研究小組、研究中心與研究院學部是脈脈相通的。

上述的發展其實並非偶然，事實上，自中文大學成立以來，即認識到並強調在大學教育、特別是研究院教育當中，研究是極為重要的。李卓敏校長在「漸具規模的中文大學，一九七〇—七四」這本報告書中，很清楚的指出：「研究院教育就各種基本學術範圍，培植程度甚高的專才，使他們能夠運用擅長的專門知識來解決各種難題。同時，大學還造就若干類專業人才來處理這個複雜的、需要各種技術的社會。」（二四頁）「研究是大學的原動力。如果大學的研究工作完全停頓下來，研究院便名存實亡；學習也變得枯燥無味。在這樣一所缺乏動力的大學裡，教師便會與整個學術界隔絕，無從獲得刺激與啟發。即使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學術的發展仍會停滯不前。」（三四頁）

大學校長在這裡就研究與大學教育、特別是研究院課程的關係所提出的基本概念，到現在仍是本校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組發展的指南。正如校長報告書更具體的指出，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在組織上都是為加強教師研究和訓練研究生運用研究方法學而設立。研究所着重範圍較廣且兼及科際的研究，研究計劃可由一人單獨或多人合作進行。但是假如計劃的規模相當龐大，需要助手多人方可進行，同時又獲得外界的支持和資助，則可在研究所下另設專門單位——即研究中心。如此，研究計劃的範圍更加明確，並且在進行時有較大的彈性。從理論上說來，研究中心必需有重要及龐大的研究計劃或某一新計劃需要進行時方可成立。如果研究中心完成了這些計劃或不再進行龐大的研究，該中心便須解散，但個人的研究仍可作為有關研究所下的一項研究計劃而進行。研究所將所有相關的研究計劃劃入其範圍，因此可以製定一些可為研究生提供全面及多樣化研究經驗的政策和程序，由此看來，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組與研究院之間必須合作無間。

在中文大學，大致上兩方面已經合作得很好，現在經常有研究生參加各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組的研究工作，作為各計劃的研究助理或練習生，求取有關經驗，以撰寫論文。研

究生這樣當然獲益不淺，而計劃導師能夠得到他們的協助，亦甚覺可貴，特別因為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組經常都是人手不足；事實上，很多計劃如果沒有研究生的協助，是很難如期完成的。

在教師方面，合作的形式通常是不同學系的教師就個別研究計劃自動加入有關的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組。不過，在其中一個研究所和一些研究中心內，不時有需要聘請少數的專職研究人員，這些研究人員很多時候需要負責兼教本科課程。這類合作非常成功，預料將來有擴大的必要，藉以借助資深的研究人才和學者來加強研究院課程。

中文大學以融滙貫通中西文化為其獨特的教育目標，因此對於精通中國文化和善用西方的實驗方法、科學知識是並重的。這項理想不單影響到本科課程的製定，更左右了研究院課程的開設和研究計劃的進行。事實上，中國文化研究所就是根據這精神而成立的。不過，我們必須強調一點，就是對中文大學來說，「中國文化」是泛指中國文化整個複雜的體系，包括國內外生活各方面的細節。根據這個觀點，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內很多非純科學的研究計劃，其實多少都與中國文化的研究有關；而這

些研究計劃之中，有大部份——特別是社會及專業方面的研究——是以與香港社會直接有關的問題為研究對象，其他有些是以香港為主要參考點而進行的比較研究，因為在香港有最佳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例子。在這情況下，研究生對這方面的研究興趣自然亦被培養起來。站在中文大學的立場看，這種發展是健康的，而大學決定繼續朝這方向邁進。

中文大學的研究院課程和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組在這方面的平衡發展，越來越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中大與海外高等教育機構的合作研究計劃，與日俱增，就是最好的證明。至於經費方面，中大的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組除了獲得香港政府和香港工商界領袖支持外，多年來都得到知名國際基金會的慷慨資助，其中包括福特基金會、亞洲協會、美倫基金會、哈佛燕京學社等。而哈佛燕京學社除了資助研究計劃外，更設有特別津貼，作為出版中國文化研究範圍內最好的碩士論文的費用。

雖然從長遠的教育觀點看來，十年是很短暫的期間，不過，我們在回顧中文大學研究院和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組過去十年來的發展時，有信心它們必能隨着大學穩定發展的新紀元的到來，而更臻於成熟。

# 附表

## 研究院

學部	成立年份
<b>甲、人文學科</b>	
(一) 中國語言及文學	一九六六
(二) 歷史	一九六六
(三) 哲學	一九六六
(四) 神學	一九七二
(五) 英文 (計劃設立)	一九七八
<b>乙、自然科學</b>	
(一) 生物	一九六九
(二) 化學	一九七〇
(三) 生物化學	一九七二
(四) 物理	一九七二
(五) 數學	一九七三
<b>丙、社會科學</b>	
(一) 地理	一九六六
(二) 社會學	一九七〇
(三) 經濟	一九七四
<b>丁、專業教育</b>	
(一) 兩年制工商管理	一九六六
(二) 三年制工商管理	一九七七
(三) 電子學	一九七二
(四) 教育學 文憑課程 學位課程	一九六五
(五) 傳播學	一九七三
(六) 社會工作	一九七七

## 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名稱	成立年份
<b>甲、中國文化研究所</b>	
(一) 教師研究計劃	一九六七
(二) 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	一九六七迄今
(三) 翻譯中心	一九七一 (一九七七暫時解散)
(四)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一九七八
(五) 比較文學及翻譯中心	一九七八 (一九七八年擴充為比較文學及翻譯中心)
<b>乙、理工研究所</b>	
(一) 教師研究計劃	一九六四
(二) 中藥研究組	一九六四迄今
(三) 廢物生產食用蛋白質研究組	一九七五
<b>丙、社會人文學科研究所</b>	
(一) 教師研究計劃	一九七七
(二) 經濟研究中心	一九六四
(三) 社會研究中心	一九六五 (一九六九年改組)
(四) 傳播研究中心	一九六六
(五) 地理研究中心	一九六六 (一九七三年解散、一九七四年重組)
(六) 東亞研究中心	一九七七
(七) 公共事務研究中心	一九七七 (一九七七年底解散、待一九七八年九月新主任上任後重組)
<b>丁、工商管理學科研究所</b>	
	一九七八

# 新成立的研究單位

中文大學爲了提倡個別和集體的研究工作，設立以實際研究爲主的研究所，在研究所內又設有研究中心或研究組。研究中心或研究組的設立，主要是爲了使規模龐大的研究計劃目的更爲明確，研究人員在行政和管理上較爲獨立。

中文大學原來設有三個研究所：中國文化研究所、社會人文學科研究所、理工研究所，一九七八年初又成立了第四個研究所——工商管理學科研究所。

## 工商管理學科研究所

中文大學一九七六年設立工商管理學院，此後即感到有需要積極進行研究工作，與教學相輔相成，工商管理學科研究所終於在一九七八年二月成立，目的爲：

- (一) 提供優良之設備，以促進教師之研究工作；
- (二) 爲教師與校外研究人員之合作研究，從事溝通工作；
- (三) 鼓勵教師探討與本港有直接關係之問題；
- (四) 協助研究人員獲取各方資助，俾能從事富有意義之研究工作。

研究所成立時間雖短，但已經完成了一些研究計劃，其他有些正在進行，有些則已擬備大綱

提交有關方面考慮，舉其要者有：

- (一) 發展中國家在另一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
- (二) 香港的直接外國投資環境
- (三) 香港公司的出口
- (四) 駐港日本企業人員的行徑
- (五) 傳播媒介消費習慣的研究
- (六) 商業銀行選擇新行址的研究
- (七) 消費者光顧服裝店的抉擇模型
- (八) 基督敎機構的市場學及管理學觀念

一般來說，研究人員對與本港工商界和政府合作，探討有關它們的產品或服務的問題極感興趣，他們發覺外界非常倚重所採用的新進方法如多向量表法及交換分析等。研究所藉着各項研究計劃，一方面使到一門本來是純專業性的學科獲得學術性的研究和處理，另一方面又協助香港工商界解決在競爭日益劇烈的世界貿易中所遇到的困難。

除研究工作外，研究所將主辦研討會、講座及其他活動，以提高研究興趣，促進思想交流。

##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一九七八年二月成立，隸屬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心的主任是世界知名考古學家、現任中大副校長鄭德坤教授。

研究中心的宗旨在於：

- (一) 提倡中國考古學及藝術的研究；
- (二) 提供中國考古學及藝術研究所所需的設備；
- (三) 與中大文物館、藝術系、歷史系定期合辦有關考古與藝術的專題展覽會、研討會；
- (四) 負責教授研究院課程中有關中國考古學與藝術的部分；
- (五) 與海內外博物館或其他機構交換有關考古發現的最新資料。

中心的研究計劃，牽涉範圍甚廣，舉凡歷史、藝術、人類學、經濟學、都包括在內，是較為典型的科際研究。刻在進行的研究計劃有：

- (一) 鄭德坤教授：漢代考古學
- (二) 饒宗頤教授：港星兩地法書名蹟
- (三) 林壽晉先生：黃河盆地的新石器文化
- (四) 林壽晉先生：戰國細木工接合工藝
- (五) 屈志仁先生：漢代以後玉器之研究

## 公共事務研究中心

公共事務研究中心在一九七八年二月成立，隸屬於社會人文學科研究所，目的在加強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師的研究工作。中心特別着重與香港、中國、東南亞政治有關的基本及時事研究，刻在進行的研究計劃有：

- (一) 七十年代的中日關係
  - (二) 反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
  - (三) 中國外交政策及其對馬來西亞華僑的影響
- 公共事務研究中心將對現代中國政局及其與鄰國關係的研究有實際的貢獻。

## 孔安道電腦翻譯研究中心

孔安道電腦翻譯中心於一九七八年四月成立，隸屬理工研究所，主任為樂秀章教授，副主任為孔慶琛博士。成立中心的主要目的為：

- (一) 發展以中文為目標語言的電腦翻譯系統；
- (二) 發展、設計及建立中文輸入電腦系統；
- (三) 促進電腦翻譯的研究。

電腦翻譯研究中心正在進行的計劃計有：

- (一) 由樂秀章教授主持設計及建立中文輸入輸出系統，可供存儲及取回資料、以及將中文字在屏幕上打出來。已經製成的硬件包括：(甲)兩個中文字鍵盤、(乙)兩個開關插件板、(丙)一個繞綫插件板、(丁)一塊電板。軟件方面，則仍在研究。
- (二) 設計一座發光二極管，供中文輸入輸出系統之用。
- (三) 研究以中文為目標語言的電腦翻譯系統。

研究之外，中心又出版了一本「機器翻譯文獻目錄」。

## 比較文學與翻譯中心

一九七一年成立的翻譯中心經於本年初改組為比較文學與翻譯中心，其下分設兩個小組：(一)比較文學組，(二)翻譯組。

比較文學組的主要目標在於研究中國文學理論，並根據中國文學的觀點，對中外文學進行比較研究，以補充西方比較文學者的成就，把中國的理论和方法擴大為世界性而非局限於本國或地區性的概念化知識。研究計劃包括：

- (一) 編纂中國文學批評語彙參考書
- (二) 編纂比較文學研究手冊：內容包括詞語、書目、引文
- (三) 中譯西方文學理論書籍

翻譯組將繼續前翻譯中心的計劃，其中包括：仍以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為主的英譯中工作；與各學系合作編譯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詞彙；出版中譯英期刊「譯叢」和「譯叢叢書」。已出版的「譯叢叢書」有兩種：「中國古典詩寶藏」（唐安石）、「藝術的詮釋」，即將付印的有：

夏志清、高克毅合編：「元雜劇選」  
劉師舜：「唐宋八大家文選」

此外，一項新的編印「譯叢參考資料」計劃已在着手進行，現正籌備出版「中國成語詞典」的英譯。

### FOREWORD

AUTOMATIC TRANSLATION OF NATURAL LANGUAGES BY MACHINE HAS BEEN GOING ON FOR NEARLY THREE DECADES. THE ELECTRONIC COMPUTER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T. IN FACT MANY RESEARCHERS IN THE LATE FIFTIES AND EARLY SIXTIES HOPED THAT THE COMPUTER COULD SOLVE ALL THEIR MACHINE TRANSLATION PROBLEMS. PROMISES WERE MADE BUT WERE NEVER DELIVERED. IT WAS NOT UNTIL THE 1967 ALPAC REPORT THAT MOST, IF NOT ALL, MACHINE TRANSLATION PROJECTS WERE ABANDONED.

THERE HAS BEEN A REVIVAL OF MACHINE TRANSLATION SINCE THE REPORT WAS MADE PUBLIC. RAPI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IN COMPUTER DESIGN AND APPLICATION HAS BROUGHT NEW HOPE TO AUTOMATIC MACHINE TRANSLATION. SHOULD THE LANGUAGE BARRIER BE BROKEN BETWEEN NATIONS, IT WILL CERTAINLY PROMOTE CROSS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NEEDS FOR AUTOMATIC MACHINE TRANSLATION OF NATURAL LANGUAGES HAVE COMPELLED THE EDITORS OF THIS VOLUME TO COMPILE A BIBLIOGRAPHY ON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CLOSELY RELATED DOCUMENTS CONTRIBUTED THROUGH THE YEARS BY NUMEROUS RESEARCHERS AND SCHOLARS WORLD-WIDE.

TH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FOR THIS VOLUME COME FROM 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THE EDITORS AS WELL AS FROM THE SPECIALIST GROUP ON MACHINE TRANSLATION OF THE BRITISH COMPUTER SOCIETY WHOSE ASSISTANCE HAS BEEN INVALUABLE. THE SUPPORT, ASSISTANCE AND ENCOURAGEMENT OF MISS MARINE MACCAFFERTY AND MANY OTHERS ARE GRATEFULLY ACKNOWLEDGED.

LOH SHIU-CHANG  
OCTOBER, 1978

## 機器翻譯文獻目錄

## A BIBLIOGRAPHY OF MACHINE TRANSLATION

Compiled by:  
Loh Shiu-chang  
Hung Hing-sum  
Kong Luan  
Hu Yung-chi

Hong Kong Research Centre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 談士博標聰林

## 測預濟經量計

林聰標博士與德國波恩大學克里爾教授



中文大學經濟研究中心經過多年研究，設計了一個「計量經濟預測模型」，並於今年九月開始定期發表香港的經濟預測，以供本港工商界人士及政府參攷。經濟研究中心的模型除了對本地有所貢獻外，最近又獲得「國際經濟預測聯繫計劃」邀請加入太平洋區預測組的系統，以日本京都大學為聯絡中心。「國際經濟預測聯繫計劃」的目的是將各國的國家經濟模型聯繫起來，以作全球性的經濟預測。

「中文大學校刊」特別訪問了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社會科學院院長林聰標博士，請他談談他所設計的經濟預測模型。

問：經濟研究中心經濟預測模型的成功，是值得慶賀的，請問這項研究計劃是怎樣和在什麼時候開始的？

答：工商界和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士都會知道經濟預測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的重要性。近年來，很多國家發展了自己國家的預測模型，但香港卻沒有。直到兩年前，我們發覺有關經濟的資料逐漸多起來了，要設計一個模型是可能的。當時李卓敏校長和邢慕寰教授都大力支持這項計劃，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劃，我們着手設計這個模型，以求對香港社會有所貢獻。

問：爲什麼計量經濟預測比其他方式的經濟預測更爲科學化和準確？

答：其實很多工商界人士自己都有作經濟預測，而且有時可能頗爲準確，不過，嚴格說

來，這些預測都不甚科學化，因爲它們大多數是根據直覺而作出的，並且可能受到個人偏見的影響。計量經濟學家則不然。他作預測，首先要搜集有關經濟變數的資料，然後應用經濟原理和運用數學及統計工具，去找出這些變數在統計上的關係。他拿資料來實驗，只採納那些在統計上證實是可以接納的。實驗的結果，就是使各經濟變數之間許多不明顯的關係顯露出來，藉此可以更清晰更全面地看到經濟的全景，預測因而也更加準確。因此我們說計量經濟預測比其他方式的預測更爲科學化。

問：請問經濟研究中心的模型與國際經濟預測聯繫計劃有什麼關係？

答：國際經濟預測聯繫計劃的工作分爲兩方面：將各國的國家模型聯繫起來，以及對各國的出入口貿易作出連貫一致的預測。關於第一項，我們將會把模型中一些方程式選出來送往太平洋區小組，便利聯繫工作。至於第二項，所謂「連貫一致」的預測，就是說有關由甲國輸往乙國的出口預測要與乙國從甲國輸入的入口預測相符合，有關這些資料，我們亦將與聯繫計劃的小組交換。

問：請您略爲介紹一下經濟研究中心的模型。

答：經濟研究中心的模型像其他的預測模型一樣，包括了一組聯立方程式，但不同的地方卻是，該模型是一個非線性的系統。它共有四十二條方程式，其中包括許多「內源的變

數」及「外源的變數」，我們所要預測的是內源的一套，它們的數值唯有靠解了那組方程式才能得到。經濟研究中心的模型包括的重要內源變數有：國民生產毛值、進出口貿易價值、消費開支、通貨膨脹率等，外源變數是在解方程式之前輸入模型的資料，如果它們的數值是錯的，預測的結果可能也是不可靠的；而它們的數值得假設為預先知道的。常見的外源變數有：政治因素、雨量、時間因素等。

問：你們是如何預測政府政策的影響的？

答：如果我們單用經濟普通常識，是很難估計政府政策的影響。例如，增加政府支出，是會提高國民總生產，但當國民總生產提高了，人們就會覺得有多些錢，可以多點消費，消費的增加又會提高收入的水平，整個循環會不斷重複，直至各項轉變的影響小至不為人察覺為止。如果我們要預測政府增加支出的總結果，就要把所有這些影響加起來一同考慮計算。很明顯，單是普通常識是不夠的。在我們的模型裡，這類問題是不難解決的，政府支出是屬於外源變數之一，預測時只須將這項變數的新數值輸入模型，然後解了這組方程式便可。內源變數的新解值已經將政策轉變考慮在內了。

問：經濟研究中心的模型是不是沒有偏差的？它有沒有局限性的呢？

答：我們必須承認雖然計量經濟預測是一門科

學化的工作，但同時它也是藝術。它是科學化的，因為整個模型是根據經濟原理和統計學理論而成的，不過即使這樣，仍然會有錯誤，因為統計上的推論並不能完全免於機會性的干擾。它是藝術，因為在建立模型的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會有些任意的決定。此外，一些外源變數的數值本來應該預先知道，不過很多時候卻不能在事前準確地知道；因此，很難有任何模型是完全沒有偏差的。

問：在建立模型時，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答：要討論所有的困難是沒有可能的，因為這些主要是屬於技術性的。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我們所應用去建立模型和解模型的兩種方法——二階段最小二乘法及高斯—西度爾法——需要我們列寫很長的電腦程序。此外，資料不多也是一個問題，在香港得到的有關資料通常都比其他地區少，所包括的年期也較短，很多方面的資料和統計等，都是在最近十多年才開始收集保存。

問：最後，經濟研究中心的模型加入國際經濟預測聯繫計劃有什麼實際意義？

答：國際經濟預測聯繫計劃所作預測的可靠性高低是有賴於其所包括的國家模型的質和量，香港是東南亞區內頗為重要的經濟區，我們的模型加入該計劃的太平洋小組後，相信可以對改進整個計劃有所貢獻。此外，這類國際性合作可以給予各國學者更多機會交換意見，因此必然極受學術界人士歡迎。

# 醫學院消息

## 醫學教育諮詢委員會

### 第三次會議

中文大學醫學教育諮詢委員會於一九七八年二月廿七日至三月四日在香港舉行第三次會議。委員會成員為：

英國伯明翰大學精神學系主任杜得維教授 (Professor W.H. Trehowan)  
伯明翰大學前任心臟科教授顏樂德爵士 (Sir Melville Arnott)

英國諾定咸大學醫學院院長兼生理學教授格威爾教授 (Professor A.D.M. Greenfield)

英國愛丁堡大學臨床外科教授福維斯教授 (Professor A.P.M. Forrest)  
美國紐約約賽亞·美斯基金會主席鮑華斯博士 (Dr. John Z. Bowers)  
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兼病理學教授紀本生教授 (Professor J.B. Gibson)

本港醫務衛生處處長唐嘉良醫生  
大學醫學院院長蔡永業醫生

在這次會議中，委員會除了省覽新醫學院籌劃情況及進展，包括基本醫學大樓（即李卓敏大樓）及位於沙田的教學醫院興建計劃的進度，又於二月廿七日勘察沙田醫院的院址，並於三月四日與大學校長晤談，討論醫學院入學資格、課程、教員職級及銓絃等問題。

## 「醫學教育與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醫學院院長蔡永業教授繼醫學教育諮詢委員會會議之後，應香港西區扶輪社之邀，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演講，題目為「醫學教育與香港中文大學」，講辭撮要如後。）

香港中文大學開辦醫學院，其目的在向學生提供醫學教育。是項教育，由醫預科開始，經臨牀前期、臨牀教學、進修課程以至在職教育，亦即執業後之繼續進修，成爲一總體。其實施可分爲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爲醫預科，醫預科課程之設計，

在使學生獲得醫學上所需之物理、化學及生物學的進一步知識。此外，通識教育中的心理學及社會學皆與醫學有密切關連，醫預科生亦須修習。又爲了增進學生對中英語文之流暢運用，醫預科生必須與其他科系之一年級學生一樣，必須修讀大一中文及大一英文。由此可見一年醫預科在六年醫科課程中所佔之地位，較諸多讀一年中學要高的太多了。

第二階段分爲兩年臨牀前期及三年臨牀課程，另有一年實習。英國一般醫學院課程皆如是。將來中文大學醫學院畢業生，除了在中大的教學醫院實習外，也有機會到其他醫療機構實習，俾獲較多方面及廣泛之經驗。

第三階段爲進修課程之各種專科訓練。爲配合社會之迫切需要，中大醫學院對社會醫學及全科之研究與教學，將特予注意。研究生在其專門學科之進修時，亦得參與醫療服務，如此亦可協助解決公眾醫療服務人手短缺之情況。

第四階段爲對新界東區之執業醫生提供繼續進修機會，定期開辦重修課程並舉辦研討會，俾從事醫療工作者得有溫故知新之機會。

# 智據的新世紀 (註)

宣偉伯

〔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宣偉伯教授講辭摘要〕



宣偉伯博士 (Dr. Wilbur Schramm) 是世  
界「傳」學研究與「傳」學教育的泰斗，今日的  
傳學全是他和另外二位大師所奠下的基礎。拉斯  
威爾 (Harold D. Lasswell) 是理論家，拉茲斯  
菲德 (Paul F. Lazarsfeld) 是方法學的高手，  
而宣博士則是集大成的學者，差不多所有傳學  
的領域都逃不過他睿智的觀察與剖析。傳播與  
國家發展、傳播與家庭計劃、電視對兒童的影  
響，視聽媒介與教育、傳媒的社會責任，國與  
國以及文化與文化間的消息流通等等，都是宣  
博士研究的主題。

除了從事研究外，宣博士先後創辦了三所  
知名的傳學研究院，最早是在愛奧華大學，其  
次在史丹福大學，最近則在夏威夷的東西中心。

在知識的荒原裏，宣博士永遠是位精力充  
沛的探險者，今年八月他應中文大學之邀出任

傳播研究中心的第一任胡文虎傳學講座教授，  
協助大學設立傳學的研究院課程，以及開展傳  
播研究中心的研究計劃。

宣教授著作等身，先後出版過一百三十多  
種學術論著，此外，他還發表過許多文學作品。  
在他的學術論著中，像「傳媒與國家發展」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大眾傳播的責任」(Responsibility in Mass  
Communication)、「大眾傳播」(Mass Commu-  
nications)、「傳學手冊」(Handbook of Commu-  
nications)、「傳媒、信息與人」(Men, Messages,  
and Media)、「大媒介、小媒介」(Big Media,  
Little Media)、「和」十年來與十年後的傳與變」  
(Communication & Change—the Last Ten  
Years and the Next)等，都是膾炙人口的經典  
之作，有不少已先後譯為中文、日文、韓文、阿  
拉伯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及義大利文等。

(註) 智據 (Information) 是消息，資料，知識的總稱。人類的實質環境由三個基本因素構成：質 (Matter)、能 (Energy) 與智據。世上事物都是質與能互變而生，質與能互變的知識與人類運用的經驗，成為更多與更進步的工藝的基礎和依據。這些消息，知識與經驗構成智據，包括科學裡頭的數據 (Data) 在內。

我一直覺得很稀奇，奇怪大部份決定今天人類傳播形態的大事都是很近才發生。今天我很不意思，要在這裡，在中國五千年悠久歷史的背景前談這末嫩的現代科技。公元一九五〇年蔡倫已經發明了紙。比他早一個世紀，中國已經設立擁有三萬學生的太學。

人類傳播事業的發展愈來愈快。從語言的發明到有文字，總經歷了幾萬年；從文字進到印刷，也用了好幾千年，從印刷機的發明到第一具電子傳播媒介，花了幾百年；而從第一具電子媒介發展到月球電視直播，只用了幾十年。

今天我像這種年紀的人，可能聽過第一個無線電廣播節目；參加最早的一次電視節目開播；看到第一架錄音機的出現；用過最早期的影印機；試過第一部照相排字機；聽過第一個人造衛星傳來的嗶嗶之聲，幫助過建造第一座大型電子計算機。我知道這些東西，因為我都經歷過。這些事都發生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如果一個人可以活兩輩子，或者說將我的年紀乘二，那麼我們可以親眼見到一切叫做電子媒介與圖象媒介的東西的出現，這包括攝影術的發明，讓人類能有視覺記憶；電報的發明，比希臘神話中宣佈特洛伊城失陷的告急烽火還跨進一步；電話的發明，讓人類自己的聲音傳到

喊叫以外的範圍。此外，還有電影以及一切電子媒介，和正影響我們今天及本世紀人類生活的三個重要年代——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及一九四七。

### 重要的三年

一九四五年，亞瑟·克拉克在英國「無線電世界」這本雜誌中發表了一篇只有四頁的文章，談到通訊衛星的設計和遠景。他覺得十分歉疚，在附給編輯的信中特別解釋，這種事也許要等五十年，到一九九五年才會出現。可是，我們都知道，第一顆人造衛星在一九五七年便已升空。只有十二年，不是五十年。

一九四六年，約翰·凡·紐曼在當代一篇著名論文中，確立了電子計算機的原理和設計。在本世紀內，對人類思想方法和智據處理影響之大，可能沒有一篇論文能出其右。因為電子計算機很可能是本世紀末最偉大的傳通機器。

一九四七年，貝爾電話公司實驗所的三位物理學家巴丁、布瑞坦和沙克雷，發明了電晶體（俗稱原子粒），電子機器的體積因此大大縮小。有了電晶體，我們可以製造容量巨大的人造衛星和體積小巧的小型電子計算機。（我

曾協助製造的第一座電子計算機，大到要一層樓才裝得下，功能並不比目前只有辦公桌大小的電子計算機大。）有了電晶體，才有袖珍計算機，才能讓開發中的國家那些電力達不到的地方有收音機可用。過去十年，主要由於電晶體的發明，亞洲開發中國家收音機的數量增加了四倍，非洲增加了三倍，拉丁美洲增加了兩倍。我不想在這裡談機器，我要講的是這些機器對我們會有的影響。

今天世界上有件大事發生，一直在那裡很久，實在太大，連我們這些非常關心傳播和現代史的人都沒有注意到。我們突然發現自己已經身處一個新時代，已經在這個時代的最早幾十年中。這是一個被若干人名之為「智據世紀」的新時代。

### 智據世紀

智據世紀有些什麼徵兆呢？勞動力分配的改變是其一。據普林斯頓大學馬卡甫 (Ervin Machlup) 這位處理數學非常保守的經濟學家估計，目前美國的總勞動力中，有十分之四點五用在智據的製造、收集或分配上，包括支持這些智據活動的勞動力在內。他認為：知識工業目前或在最近的將來，會大到僅次於農業，成為世界第二大工業。

另一個徵兆就是投資形態的改變。一九六二年，據馬卡甫估計，美國人民收入百分之十五用於智據服務業。他指的是傳播媒介、教育、電話與電報、郵政、圖書館、電訊事業、廣告、研究與發展等。

另外一個徵兆，是智據流通形態的改變。它會流通得更快、量也更大。要我們在大學裡的人相信這點並不難。從前，在學術雜誌方便到手的地方，我得經常閱讀四十二種之多。要是希望自己凡是重要的學術新發現都不漏掉，我得一天讀足二十四小時。這，我們都有過經驗。我們要問自己的是：還要看多快才夠，還要看多少才夠？

## 多和快多少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遠道消息傳遞的快慢完全得看運輸工具。

不過後來通訊與運輸工具終於分家。消息可以用電報、電話、無線電、電視或人造衛星來傳遞，快如光速。現在，我們對信息傳播快捷視為當然，因而對郵遞服務不滿。對要花幾分鐘接通一個長途電話，也嫌時間太久。全美國四分之三的人能坐在電視前看遇刺總統葬禮實地播放，大家毫不覺得稀奇。這讓我想起了一件幾乎不會再去想的事：去年夏天，我與同事爲了好玩，大家坐在一道計算了一下把整座法國國家圖書館的藏書，由巴黎運往倫敦大約需要的時間。如果能把藏書的資料通過儲入電

腦，然後利用輸送線路，傳到英倫海峽另一端的電腦，要是能取得足夠的輸送線路，約需七至十七分鐘，長短因情況不同而異。

由這種速度的增加，讓我們來看看量的增加。從圖書館的變化也可以看出這影響。一三三八年，公認爲當時西歐最大的蘇彭圖書館藏書僅有一千七百二十二本。一四五〇年，整個歐洲圖書不會超過三萬本；五十年後最普遍的估計約爲八百萬冊。現在全世界藏書超過八百萬冊的圖書館有半打。本世紀，一般大圖書館的藏書量每十四年增加一倍。若以一個世紀來計算，成長率爲百分之一萬三千。事實上，今天已有數以千計的小鄉鎮圖書館，可供閱讀的書都多過蘇彭圖書館珍藏的一千七百二十二本。

## 五項預測

如果我們的確在向智據世紀邁進，我們可以預測一下這新時代的動向：

一、智據的數量會大量增多，多到造成嚴重的智據過多、過剩的問題，勢必要想出許多處理與組織智據的新方法來應付。奉勸諸位同學趕快完成學業，要是拖上十年，學業負擔將增加兩倍。

二、遠地來的智據量比例增大。距離不再是智據交換的重要決定因素。要是用人造衛星傳遞消息，一萬英里與一百英里在成本上沒有區別。人們的注意力，不再囿於一地一國。「世界一家」雖未來臨，却已接近。

三、智據傳遞速度增快，在很多情形下，

大眾得到消息的速度幾乎和領導層一樣快。外交上傳統享有的保秘時間即將過去。因此，一有問題，必須迅速反應，包括政府向人民作的解釋在內。民衆在施政上的地位將更形重要。雖然馬克斯的夢想還沒能在地球上實現，不過，有一天終能成爲事實。我指的是他的一個理想：國家逐漸「消逝」，人民逐漸負起一切責任。

四、在理論上，智據幾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傳遞，包括家庭、學校、圖書館、辦公室、工廠、村落、甚至愛斯基摩人的家裡。我們已經有了活到老，學到老的環境。學習機會有了許多重大變革。

五、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大多通過電子眼、電子耳、傳媒的數字符碼及電訊事業，傳給我們。因此，誰掌握這些消息的通路，誰就控制了我們的「世界之窗」。今後一個世紀，智據的控制、取得、處理、儲存、取回與播散的能力，會像今天的經濟與軍事資源一樣，成爲明日的國家資源。

## 變革的影響

即令今後的變革沒有我說的那麼宏偉，影響一定有。除了我們外，我們的下一代和下一代的子女都會受到影響。因爲講到人類傳播，有一點是十分確定的，這就是傳播的方法一變，人類的生活與社會也會跟着發生深切的改變。

十五世紀，西方人重新發現了一些亞洲人

早已知道的印刷術，加以採用，並在他們獨有的有利環境中作進一步發展。有了印刷，平民第一次有機會識字、受教育，接受參與公眾事務所必需具備的知識。革命爆發，君主被推翻，民主興起。沉睡了幾個世紀的科學在這些國家中驚醒。社會再度產生活力。藝術、文學、思想都起了巨大的變化。有了印刷，人類學會使用一種靠視覺的抽象綫性新符號來傳遞訊息。人的思維方式也受到影響，麥魯恆說得好：人的傳感器官平衡若發生變化，他使用智據的方法也隨之改變。

印刷術影響之大，的確驚天動地。但智據世紀的出現主要為比印刷更新的媒介的產物。新媒介的影響力可以與印刷相比嗎？

如果我藏拙點，應該在提出這個問題後便停止講。因為談印刷術的影響遠比談電視和電子計算機容易。事後聰明不會錯，先見之明常常模糊。情況太不定，很難作預測。天翻地覆也許就在我們眼前。：我們對現代科技懂得很多，對這些科技予人類的影響却瞭解得太少。

剩下還有幾分鐘，讓我提出一些問題，但不是——都能解答。我為人問得最多的問題，是關於更驚人的發明會不會在等着來。比方說，繼電視之後的新媒介是什麼？答案當然是不曉得。電話在一八八〇年還見不出端倪，要到一八八六年貝爾示範電話，人們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一九二六年，電視機初次露面，注

意的人人不多。大家為無線電而瘋狂。是有驚人新發明呼之欲出，至少我還不知道。

很多令人振奮、等待出籠的新科技，大都屬於波導、激光、纖維光學之類，可以把傳播頻道的輸送能力增加幾百到幾千倍。袖珍電子計算機不再新奇，但它可以讓一般人也享受一下這種偉大機器的一些奇妙的功能。目前，電子郵遞實現的可能性很高。到一九九〇年，半數以上的郵遞工作很可能由電子處理。這都不是什麼新發明，它只是我們已知道和使用的機器的延伸。真正的新發明出現時，就如許多其他偉大科技發明一樣，會使我們目瞪口呆。

### 「小人物」掌握「大媒介」

不過，有一個新發展我倒想提一提。它已經出現，影響可能比我們知道的還大。由於傳播媒介的結構複雜、組織龐大、成本驚人而又需要高度技術，因而發展成爲一種單向的傳播通路。普通人除了聽聽看看之外，殊少直接參與機會。但是這種情況正在改變。有了打字機和影印機，任何人有作品都可以自己來出版。過去不能插足廣播的常人，如今能利用錄音機、對講機和民用無線電，播出自己的節目。電影拍攝機售價日低，用法也日趨簡單，自拍電影逐漸成爲傳播、大眾藝術及紀錄的工具。今後十年，錄影可能比家庭電影更普遍。重要的不是這種科技的存在，而是有濃厚興趣用它們的人——尤其是年輕人有多少。我認爲這些發展所以重要，是因爲它們說明，單向傳播或者「大媒介、小人物」的日子，就快結束。傳播

媒介畢竟不是那末大。

我的同事中，有些認爲「下一個媒介」（如果我們可以這樣稱呼）會是一家智據中心」。由有二十四或四十八個頻道的電綫輸送智據，使用它的人對智據的控制權會比目前對電視機的大得多。他可以預訂電視或電影的娛樂節目；可以指定看某一專題的新聞報導。節目播出時他正好有事，可以錄影下來事後觀賞；他有空，可以隨時選擇收看自修課程；他可以通過有線電視採購日用品；他可以利用傳真機在家裡印出當天的報紙；又可以利用電子設備向圖書館或資料庫查詢。這些設備目前雖然昂貴，但並非不能實現。而且所指向的都是「小人物」能掌握「大媒介」。

### 知識差距

智據世紀會怎樣影響到知識差距呢？在知識領域中，很像財經世界，有一種殘酷矛盾現象：這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假設知識蔽塞者與學識豐富者，其他條件一樣，即使機會均等，前者會沒有後者學得多。教育程度高的人能從新聞中多學東西，在家庭教育好的環境長大的兒童，在學校能學習到的東西也多，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智據要是如我們所預料的大量流通，我們會不會真比過去知得多？塔夫勒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在「未來的震驚」一書中提出幾項假設。其中之一是人類不但不利用，反會逃避過量的

知識。

另一種論點也很有理：在過去，智識的增加的確提高過人們的知識水準。印刷確實辦到了這一點。收音機剛開始使用，我們的眼界與興趣都大大擴闊，電視亦復如此。我的看法只能是：人類知識水準是否提高，知識差距能否降低，主要得靠我們自己，如果我們決心提高今天世界的智識水準，讓上升的速率快過以往，我們是有辦法的。花費雖大，仍然可行。這是人的問題，不是技術問題。

## 對教育的影響

剛才我提到，教育發生基本改變的條件已經有了，活到老學到老的目標即將實現。因為，新教學工具的發展大大增強了家庭自修的可能性，電子計算機教學使個別學習的機會增加。今天教育最大的一個趨勢，是讓學習走出學校，走出課室與校園，進入沒有教室的鄉村，進到錯過教育機會和需要學習新技術的成年人那裡。幫助達到這個目的工具已經有了。新趨勢是讓學校走向大眾，而非大眾走向學校。把學習的責任大半放在學生身上，而非老師身上。課程的設計要針對個人和當地的需要。英國的「空中大學」、坦桑尼亞的「自助學校」、墨西哥的「電視學校」、以及「無形的學校」都將在許多地方出現。到公元二千年，香港中文大學設立的校外課程與頒發的校外學位會與校內一樣多。

我想再討論幾個有關電子計算機的問題。

電子計算機毫無疑問是今天最具潛力的一種機器，因為它給了我們空前大量處理智識的機會，它更可能成為人類的知識伴侶，這是其他傳播媒介所不及的。它能協助處理及操作人類在思想時所需要的資料。可是，它對人類社會能有比這更大的影響嗎？它會像今天人類分成貧富兩個階段一樣，把入分成會用電腦和不會用電腦兩大類嗎？智識處理的形態會不會像印刷一樣，影響到人類思維的方式？如果電子計算機像我們所希望的一樣，把人類生活中的很多功能拿過去，由它來處理我們的金錢、郵政、買賣、稅捐紀錄、交通資料，訂單、訂座、為政府和商業機構供應個人的履歷資料，它對人際關係有怎樣的影響呢？如何才能保證這些龐大的資料庫為我們服務，不會害我們呢？坦白的說，有關你我的資料，能隨時給人拿到手，總令我有不大自在感。其次，我們應該如何把圖書館、資料庫以及學校等智識來源組織起來，使它透過電腦為最大多數人作最有效的服務。這種結合的形態與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取得智識的方式不同。

## 「公有」和「私有」貨品

在結束之前，讓我再提一個問題，我們時常忘記智識世紀會給我們那一類的產品。未來社會中最大的一種工業將會傾大部分的力量生產所謂的「公有貨品」，而不是「私有貨品」。智識這東西性質非常特殊。如果我給你一個蘋

果、一本書或者十塊錢，你的東西增加，我的減少。如果將汽車賣掉，你付我鈔票。我有鈔票，却失去汽車。但是，如果我給你一點智識，你的所得增加，我的並未減少。換言之，智識的數量會倍增，不是減半。只要智識一傳出，就無所謂私有。這與人類舊的傳統想法多少相反。大量地製造公有而非私有貨品，對我們的思想，生活方式及財產價值觀念，會有什麼影響呢？

今天提的問題夠多的了。我們一直在討論未來，非常不好受，尤其我們當中那些遇事重事實、求客觀驗証與統計意義的人，更復如此。但是，我們不要因為這個理由就不討論未來。今天我們觀察到的跡象，至少能做出一個具有高度可信性的結論：人類的傳播正在發生一些相當重大的改變，人類行為的重大改變亦將接踵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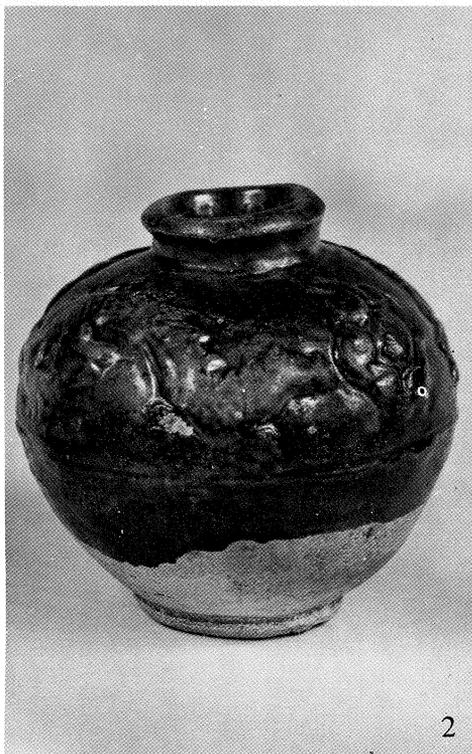
就談到這裡為止，讓我用兩位大眾都知道的人說的話作為本演講的結尾。一位是愛因斯坦。他說：「你問到未來，我當然對未來感興趣。在未來之中，我打算消磨我的餘年。」另一位是麥魯恆。他寫道：「為二十世紀的傳播作十九世紀的計劃，本是人的天性，一點不奇怪。但也絕對註定得失敗。」

（中大傳播研究中心翻譯）

# 歷年捐贈文物展覽

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  
為文物館工作處啟用誌慶，  
特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十四日  
至五月廿二日舉行「歷年捐  
贈文物展覽」。

- ① 清乾隆刻玉蘭花犀角杯
- ② 元三彩印貼花龍珠紋小罐
- ③④ 明永樂雕漆人物蓋盒
- ⑤ 釋今釋（一六一四至  
一六八五）行書詩卷
- ⑥ 釋函昱（一六〇八至  
一六八五）行書詩軸
- ⑦ 上官周松樹大中堂 清



鐵橋三日  
 倒垂枝子  
 不意象  
 照水時葉  
 古無人  
 德到一  
 閑之  
 家信  
 梅  
 全釋



客到無笛處情平懶見人林前  
 病袖殿角一間身夜色秋旻  
 淨泉聲  
 晚夢真昨閑江上  
 信又阻白門津

梅賢山居詩  
 天然



大學運動場，圖左為新建之有蓋看台，由香港賽馬會慈善有限公司捐建。

李松年先生攝



政府撥款興建之網球場

王福泉先生攝